第 39 卷 第 3 期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Vol. 39，No. 3
2 0 2 5 年 5 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May. 2 0 2 5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3.006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测度、影响与促进措施*

马理，许洋滋
（湖南大学 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摘　要］测算我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检验两者的有机结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影响两者有机结合程度的驱动因素，提出促进两者有机结合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出现阶段性下滑，对产出、消费、物价、净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工业产能利用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资本形成总额等；居民消费、房地产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影响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建议引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与杠杆率，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与质量、优化住房市场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关键词］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测度；驱动因素；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3-0042-10

The Measurement，Impact，and Promotion Methods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MA Li，XU Yangzi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degree of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n China，examines their organic integration impact on the economy in China，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gree of their organic integration，and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organic integration . It reveals that the degree of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two strategies has periodic declines in recent years，exerting adverse effects on output，consumption，price levels，and net export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industrial capacity utilization，operating costs of enterprises above a certain scale，non-financial corporate leverage ratios，and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Household consumption，real estate development，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lso affect integration of demand expansion and supply-side reforms. To foster their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policy should focus on encouraging corporate investment，improving industrial capacity utilization，reducing business costs and leverage ratios，enhancing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optimizing housing market structures，and

* ［收稿日期］2024－01－1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多重非对称影响及预警机制研究（23JD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美货币政策分化调整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头寸失衡、风险溢出与制度设计（724730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跨国传导的复杂溢出效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DSGE 多国模型与 VAR 数据检验（72073042）；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湘财证券宏观经济研究项目（2024056）
［作者简介］马理（1972— ），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金融。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measurement；driving factors；impact effects

一　引　言

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和谐有序的供需关系。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供需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表现为：供给端的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有效供给受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制约；需求端的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预期疲软，居民需求整体不旺，难以和供给形成有效匹配。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1]，这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和战略部署。在此领域，已有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的重要保证。将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2]。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但能够发展国内外两个市场，加速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3]，而且能够促进供需两端的协调匹配，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重要保障[4]。其次，两者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有助于解决经济长期增长和结构性难题[5]，同时可以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有利于推动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6]。最后，两者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构建稳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7]，又有利于增强本国贸易的稳定性，减小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冲击[8]。

(二)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因素

从扩大内需的视角来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9]和提升收入水平[10]有助于扩大内需，解决内需不足难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过融合发展可以提高消费总量，优化消费结构[11]；提升城镇化水平可以有效激发投资和消费的潜力，促进内需市场扩大[12]。除此之外，合理的减税政策可以降低物价，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13]；充分就业可以拉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达到扩大内需的效果[14]。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来看，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库存，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15]；高科技企业应用大数据等新科技可以补齐短板，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6]。减少商品市场的产能过剩，调整产品市场的供给方向，可以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7]；提高偿债能力则可以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从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8]。

(三)促进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政策建议

宏观方面的政策建议包括：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居民就业增收[19]；实施差异化的宏观消费升级指导政策，创造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20]。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度和灵活度，有效推动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21]。微观方面的政策建议包括：通过需求侧的政策拉力和供给侧的推力，促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协同并进[22]；优化消费结构和促进家庭收入增长，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内需增长[23]。引导中低技能劳动力转向服务业，也可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24]。宏微观互相协调方面的政策建议包括：推动供需两端的平衡以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兼顾[25]，完善金融组织建设，营造适宜的宏观金融环境，促进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的有机结合[26]。

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存在改进之处：第一，没有使用具体的技术方法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程度进行科学测度，无法对两者的有机结合实施精准调控；第二，缺乏供需有机结合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定量分析，目前相关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难以为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第三，未能明晰供需有机结合的驱动因素，也没有检验供需有机结合的影响效果，在“调什么”和“怎么调”等方面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相对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通过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分析方法，测算近年来我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其次，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有机结合程度对中国经济的协同影响;最后,通过随机森林算法筛选影响两者有机结合程度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并提出推动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政策建议。

二　测算供需有机结合的程度

(一)衡量内需发展的水平

在中央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中,内需水平主要关注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使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核算恒等式进行因素分解来衡量内需水平。本文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和中央文件精神,使用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值来计算我国在特定时期的内需发展水平,表示为式(1)。其中 $Demand_i$ 为内需发展水平,i 为不同的时期。

$$Demand_i = \frac{最终消费支出_i + 资产形成总额_i}{GDP_i} \tag{1}$$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而本文的主题是研究“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测度、影响与促进措施”,所以我们选择 2015 年第一季度作为时间区间的起点。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也为了指标统一计算与对比分析,我们将 2023 年第一季度作为时间区间的终点。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 iFind 金融终端数据库,频率为季度,计算得到的结果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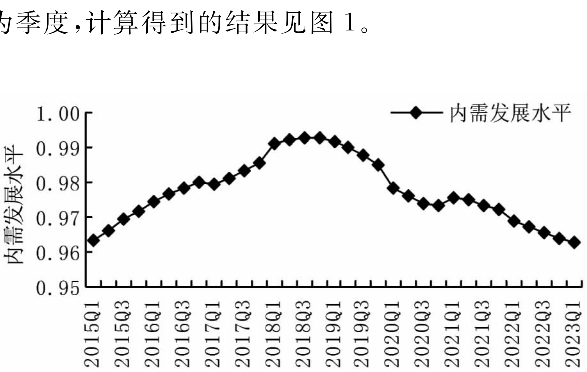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的内需发展水平(2015—2023 年)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内需发展水平一直较高,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基本都在 96%以上,并在 2018 年左右达到峰值,随后内需水平有所下滑,截至 2023 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内需发展水平为 96.28%。达到峰值后,我国内需水平持续下滑的原因可能是:首先,2018 年 8 月 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企业杠杆率开始大幅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降低需要压缩营业成本、人力成本等,导致家庭部门的收入相应减少,对消费支出产生了负面冲击。其次,2018 年 3 月 9 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大规模的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内需市场。最后,2015 年开始,我国为了稳增长实施了较大规模的需求刺激政策,例如降低乘用车购置税、放松房地产的管制政策、通过补充抵押贷款工具推进棚户区改造等。这些政策有效推动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但随着 2018 年刺激政策相继退出,我国内需水平也开始冲高回落。

(二)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

1.建立指标体系

2015 年 11 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7]。结合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我们从“三去一降一补”五个方面来衡量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具体的指标体系与计算方法见表 1。

去产能:选择工业产能利用率作为“去产能”的衡量指标,判断标准是利用率越高则去产能的效果越好[28]。

去库存:考虑到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使用商品房待售面积作为“去库存”的衡量指标,判断标准是商品房待售面积越小则去库存的效果越好[29]。

去杠杆:本文关注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的杠杆率,因此使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作为“去杠杆”的衡量指标,判断标准是杠杆率越低则去杠杆的效果越好[30]。

降成本:选择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作为“降成本”的衡量指标,判断标准是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越低则降成本的效果越好[31]。

补短板:从基础建设、科技创新、民生建设三个维度进行“补短板”的指标选取[32-33],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增加环保生态建设指标来综合衡量补短板的改革绩效。

表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水平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与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方向
去产能		工业产能利用率	%	正向表示去产能的力度
去库存		商品房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负向表示去库存的力度
去杠杆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	负向表示去杠杆的力度
降成本		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	亿元	负向表示降成本的力度
补短板	基础建设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正向表示在不同方向上补短板的力度
		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	公里	
		全国供水总量	亿立方米/年	
	科技创新	高技术产业的 R&D 机构数	个	
		国内 SCI 论文数量	篇	
		科研和开发机构 R&D 经费支出	亿元	
	民生建设	普通高中学校数量	所	
		卫生机构数	个	
		全国城市公园数	个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	万人	
	环保生态	全国绿化覆盖面积	公顷	
		国家退耕还林支出	亿元	

2. 计算方法与结果

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考虑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个方面绩效的量纲与数量级存在差异，我们使用极差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指标做标准化处理，计算方法为式(2)。其中，$\widetilde{x}_{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x_{ij} 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的实际值($i=1,2,\cdots,n;j=1,2,\cdots,m$)。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 iFinD 金融终端数据库，时间区间为 2015 年第一季度至 2023 年第一季度，频率为季度，部分月度数据参考实际含义后，进行加总调整为季频数据。

$$\widetilde{x}_{ij}=\begin{cases}\dfrac{x_{ij}-x_{\min}}{x_{\max}-x_{\min}}\cdot x_{ij}，如果\ x_{ij}\ 为正向指标\\[2ex]\dfrac{x_{\max}-x_{ij}}{x_{\max}-x_{\min}}\cdot x_{ij}，如果\ x_{ij}\ 为负向指标\end{cases}\tag{2}$$

其次，计算信息熵与指标权重。选用时间变量背景下的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计算方法为式(3)的第一个式子，其中 n 为样本中的时间点个数，e_j 为信息熵。同时，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来消除无序程度对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负面影响，计算方法为式(3)的第二个式子。

$$\begin{aligned}e_j&=-\frac{1}{\ln n}\sum_{i=1}^{n}\left(\frac{\widetilde{x}_{ij}}{\sum_{i=1}^{n}\widetilde{x}_{ij}}\times\ln\frac{\widetilde{x}_{ij}}{\sum_{i=1}^{n}\widetilde{x}_{ij}}\right),\\ w_j&=\frac{1-e_j}{\sum_{j=1}^{m}(1-e_j)}\end{aligned}\tag{3}$$

最后，计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将得到的标准化序列值和对应的指标权重相乘并加总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计算方法为式(4)。$Supply_i$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综合评价得分($i=1,2,\cdots,n$)。

$$Supply_i=\sum_{j=1}^{m}w_j\cdot\widetilde{x}_{ij}\tag{4}$$

与以往研究相比，以上计算方法不但拓展了指标体系并在全指标体系中基于实际数据进行了拟合，而且避免了常用的专家评分法可能导致的主观性评判偏差。

图 2 为计算得到的我国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为了和内需水平形成可比性，该绩效水平已经将实际数值标准化至区间[0，1]，因此取值范围是 0～1。数据显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整体上体现出宽幅波动的趋势特征。2015－2016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相对较低，最低时仅有 0.27 左右。背后的原因可能是：2015 年 11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2015 年 12 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五大抓手任务(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 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落地实施的一年。经过一年的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 2017 年迎来收获，相关政策取得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推升至 0.41。随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逐步攀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落实在各个目标领域，成效稳定而显著。

2020 年遭遇了新冠肺炎的冲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波动幅度较大。但是,在党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仍然逐步上升,基本稳定在 0.5 左右,最高时达到 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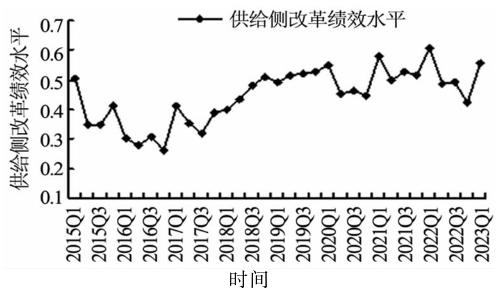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水平(2015—2023 年)

(三)测度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

耦合协调模型是一种分析多变量或多系统之间交互关系的定量工具,可以通过计算变量或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来衡量变量或系统的协同水平。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34-35],我们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平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

具体过程分为三步:首先,确定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水平两者的耦合关联度 $Cv = \sqrt{Demand_i \times Supply_i / (Demond_i + Supply_i)^2}$。其次,衡量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的整体发展水平 $T = \lambda Demond_i + \eta_i Supply_i$,考虑到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将 λ、η 均取值为 0.5。最后,测算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有机结合的程度 $DCC = \sqrt{Cv \times T}$。计算得到的结果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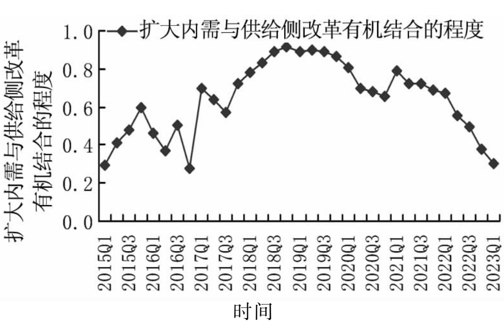

图 3　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程度(2015—2023 年)

数据显示在时间区间内,我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经历了上升与下降的过程。2018 年以前,两者有机结合的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初期的 0.29 上升至最高峰值 0.92;2018 年之后,两者有机结合的程度逐渐下降。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有效供给受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制约;同时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预期疲软,居民需求整体不旺,难以和供给形成有效匹配。2020 年的新冠肺炎,叠加全球经济低迷与地缘政治冲突,促使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程度持续下滑。截至 2023 年第一季度,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仅有 0.30,距最高峰下滑了 67.39%。

三　供需有机结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尝试探究一个变量(供需有机结合)对多个变量(产出、物价、净出口、消费等)的影响,且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和滞后期影响。常用的线性回归(OLS)模型不善于处理"一对多"且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与滞后期影响的数据情况,而且容易导致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系统变量作为其他变量的适当滞后的函数来建立模型,可以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拓展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适合探究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能够准确而全面地分析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贡献程度,所以我们使用 VAR 来分析供需有机结合的程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方程式表示为式(5)。

$$\boldsymbol{Y}_t = \boldsymbol{\varphi}_0 + \boldsymbol{\varphi}_1 \boldsymbol{Y}_{t-1} + \boldsymbol{\varphi}_2 \boldsymbol{Y}_{t-2} + \cdots + \boldsymbol{\varphi}_k \boldsymbol{Y}_{t-k} + \boldsymbol{\varepsilon}_t \tag{5}$$

其中,$\boldsymbol{Y}_t$、$\boldsymbol{\varphi}_0$ 和 $\boldsymbol{\varepsilon}_t$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的向量、截距向量和误差向量,$\boldsymbol{\varphi}_1, \boldsymbol{\varphi}_2, \cdots, \boldsymbol{\varphi}_k$ 为待估计的系数矩阵,k 为滞后阶数。本文的变量集由以下变量组成: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的有机结合程度(用符号 DCC 表示)、产出(用符号 GDP 表示)、物价(用符号 CPI 表示)、消费(用符号 C 表示)、净出口(用符号 NX 表示)。其中,DCC 由计算得到,而 GDP、CPI、C 和 NX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

(二)数据检验

1. 平稳性检验

我们通过 ADF 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2。数据显示,各个变量在一阶差分

后，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达到平稳，因此我们使用一阶差分后的结果进行后续的统计检验。

表 2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符号	t－statistic	1% level	P－value	结果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	d_DCC	－7.419	－3.716	0.000	平稳***
产出	d_GDP	－11.040	－3.716	0.000	平稳***
消费	d_C	－5.609	－3.716	0.000	平稳***
物价	d_CPI	－5.467	－3.716	0.000	平稳***
净出口	d_NX	－8.642	－3.716	0.000	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2. 协整检验

由于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通过协整检验考察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 3 给出了各变量的一阶差分的协整检验结果。数据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表 3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方程个数	特征根	迹检验		最大特征根检验	
		统计值	P-value	统计值	P－value
0	0.732344	91.98249	0.0003*	38.22355	0.0142*
At most 1	0.614604	53.75894	0.0126*	27.65105	0.0490*
At most 2	0.453043	26.10789	0.1255	17.49815	0.1498
At most 3	0.256817	8.609739	0.4027	8.607574	0.3203
At most 4	0.000075	0.002165	0.9592	0.002165	0.9592

注：*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基于表 4 检验得到的长期协整关系，我们在 Johansen 标准化的约束下建立一个协整方程，得到表 4 的协整方程检验结果。数据显示 DCC、GDP、CPI、NX 和 C 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的相关性。

表 4　协整方程检验结果

	d_CPI	d_NX	d_GDP	d_C
d_DCC	－0.408536	1.244193	－4.01816	－1.16878
	(－0.20)	(－0.25)	(－0.59)	(－0.18)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系数对应的 t 统计量。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明确了各变量是平稳序列且存在长期相关性之后，我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5 给出了各变量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的有机结合程度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强相关，可以基于此进行后续的统计检验。

表 5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因变量	被排除的变量	χ^2-value	P-value
d_GDP	d_DCC	5.864	0.015**
d_CPI	d_DCC	5.658	0.017**
d_NX	d_DCC	23.901	0.000***
d_C	d_DCC	5.049	0.02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4. 确定最优滞后期

表 6 给出了 DCC、GDP、CPI、C 和 NX 各变量的最优滞后期检验结果。综合考虑 LL、LR、FPE、AIC、SBIC、HQIC 统计量，根据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 1。

表 6　最优滞后阶数结果

Lag	LL	LR	FPE	AIC	SBIC	HQIC
0	－110.518	－	1.244	8.732	8.877*	8.774
1	－98.763	23.509	1.014*	8.504*	9.101	8.687*
2	－95.984	5.558	1.692	8.999	10.015	9.291
3	－80.558	30.853*	1.123	8.520	9.956	8.922

注：* 表示选定的最佳滞后阶数。

(三)脉冲响应

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DCC*)施加一个单位的负向冲击,由此得到对产出(*GDP*)、物价(*CPI*)、消费(*C*)、净出口(*NX*)的影响,结果见图4。脉冲图显示出明显的负向趋势,说明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下降将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具体来看:第一到第三幅子图显示,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下降导致了产出的下降、消费的下降和净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第四幅子图显示,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下降导致了物价的下降,考虑到我们的时间区间处于经济的下行阶段,所以物价的下降意味着经济萧条,也是负面影响。图4的四幅子图中脉冲均在第二期或者第三期达到负向的峰值,说明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迅速地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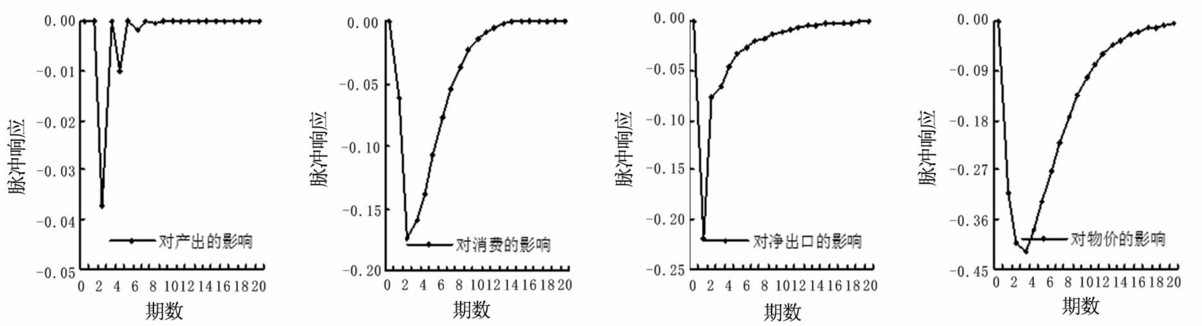

图4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对经济的影响

由此得到结论: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下降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迅速显现。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导致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下降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四 导致供需有机结合程度下降的因素

(一)基于内需视角的因素分析

1. 脉冲响应

根据式(1),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影响内需水平,而内需水平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水平两者的耦合为有机结合的程度,所以最终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总额是影响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重要原因。考虑到人口也是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尝试分析消费、资本和人口三个因素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影响。构建变量集包含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人口量、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经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确定最优滞后期[①],我们给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人口量等因素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脉冲响应图(图5)。

数据显示,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人口量各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下,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都出现了正向脉冲,均在五期内达到了峰值。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资本形成总额,其给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带来了8个单位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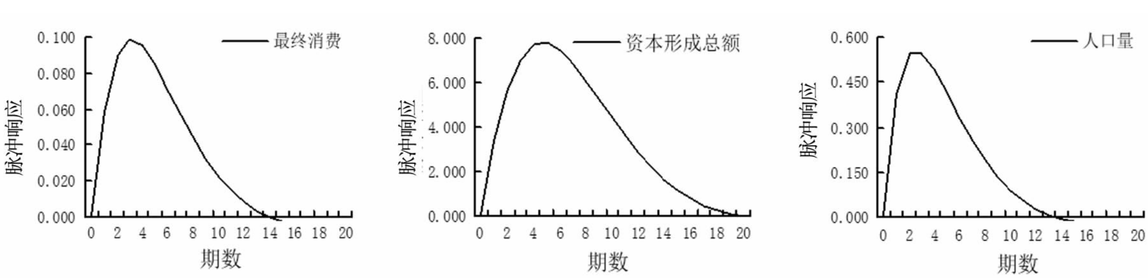

图5 需求端因素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的脉冲响应

① 限于篇幅,基于内需视角与基于供给视角的因素分析中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最优滞后期检验,未能在正文中展示,如果读者感兴趣请来函,随时备索。

2.方差分解

表 7 给出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口量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的方差分解结果。数据显示，除了受到自身的影响较大以外，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的解释力度较大，在第 20 期分别达到 15.52%和 12.88%。综合数据分析可知，资本形成总额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的影响、贡献程度最大。

表 7　扩大内需视角的方差分解结果

被影响变量	期数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人口量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	5	0.1166	0.0501	0.0504
	10	0.1592	0.1168	0.0582
	15	0.1559	0.1286	0.0561
	20	0.1552	0.1288	0.0558

(二)基于供给视角的因素分析

1.因素筛选

根据表 1，从供给端来看，影响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因素较多，我们使用随机森林算法进行多变量的重要性测度。通过计算各变量在随机森林的分支节点中的正确次数在全部划分次数中所占的比重，剔除比重较小的变量，排除对因变量解释能力较弱的变量，从而筛选出影响程度更高和能够有效提高模型估计准确度的变量。最终得到排名靠前的五个指标：去产能指标(工业产能利用率)、补短板指标(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去杠杆指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降成本指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去库存指标(商品房待售面积)，表示为图 6。数据显示，数值最高的指标是去产能指标(工业产能利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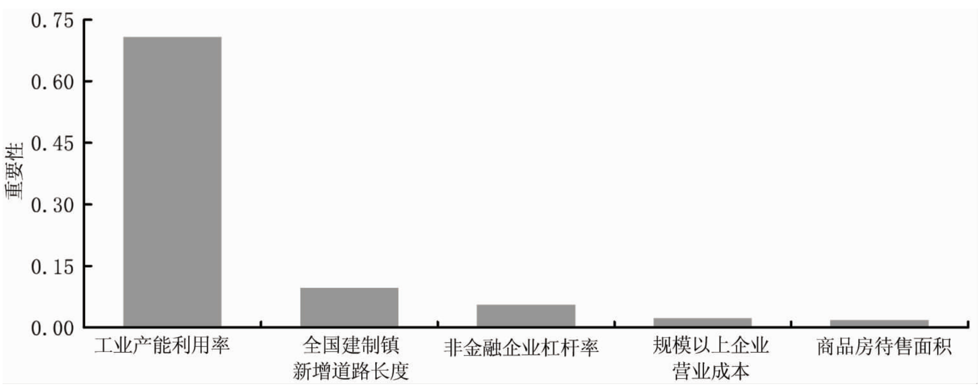

图 6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筛选的重要性排名前五的因素

2.脉冲响应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筛选结果，我们尝试分析工业产能利用率、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商品房待售面积，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影响。构建变量集包含工业产能利用率、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商品房待售面积、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经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确定最优滞后期，我们给出工业产能利用率、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商品房待售面积等驱动因素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脉冲响应图(图 7)。

数据显示，工业产能利用率增加一个单位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产生了正面影响，正向峰值为 0.1 左右。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增加一个单位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产生了正面影响，正向峰值为 0.09 左右。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增加一个单位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负向峰值为－0.3 左右。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增加一个单位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负向峰值为－0.5 左右。商品房待售面积增加一个单位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影响不明，初期为正但很快变为较大负值，而从第 4 期开始影响幅度较小，即中长期影响较小。整体来看，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下，影响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企业层面，包括规模以

上企业营业成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企业营业成本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3.方差分解

表8给出了工业产能利用率、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商品房待售面积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方差分解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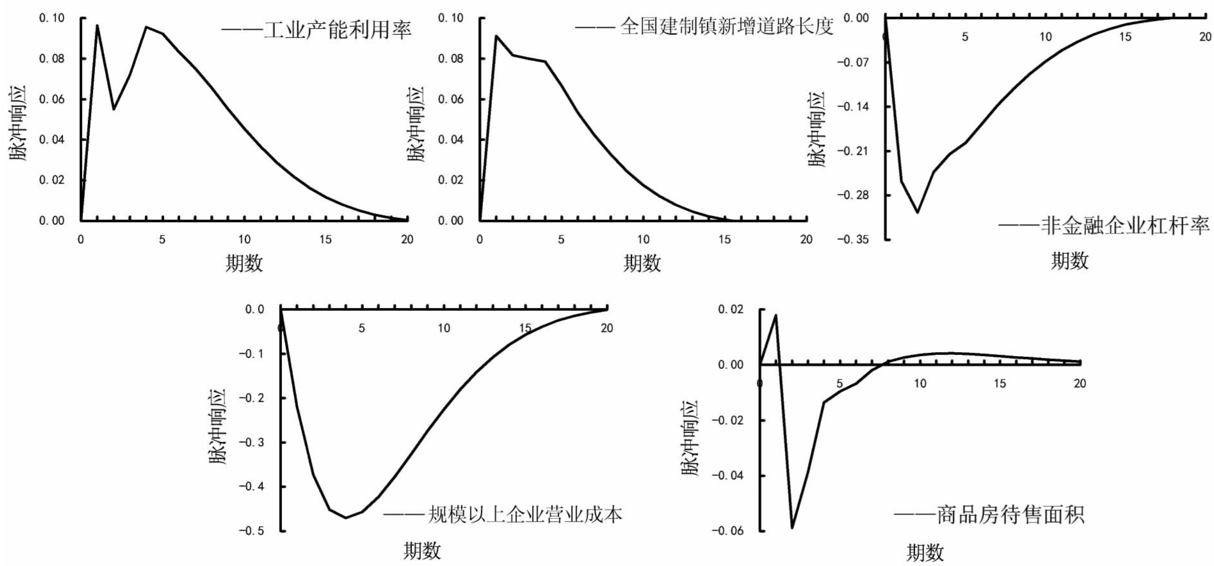

图7　供给端因素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脉冲响应

表8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方差分解结果

被影响变量	期数	工业产能利用率	全国建制镇新增道路长度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	商品房待售面积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	5	0.0180	0.0224	0.0704	0.0316	0.0036
	10	0.0335	0.0267	0.0818	0.0942	0.0031
	15	0.0361	0.0265	0.0817	0.1087	0.0031
	20	0.0362	0.0264	0.0816	0.1096	0.0031

数据显示,除了受到自身的影响较大以外,来自企业的因素例如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工业产能利用率,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的解释力度较大,该结果与脉冲分析的结果一致。综合图表的数据分析,我们应当关注企业层面的因素,如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企业营业成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等,这些因素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影响程度较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测算和检验了近年来我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程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了影响两者有机结合程度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近年来我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程度出现阶段性下滑的趋势,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企业层面,包括企业营业成本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成本、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资本形成总额等;第二,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例如居民消费、房地产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影响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由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一)通过企业发展推动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首先,引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促进资本规模增长,推动供需的有机结合。实施投资税前减免政策,降低企业固定投资成本,为扩大内需提供坚实基础。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增大有效投资规模与收益,提升企业竞争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优化政府监管流程,减少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解决民营企业投资不足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其次,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供给端的提质增效。通过优化产业支持政策,淘

汰低端产能企业，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政府基金作用，引进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生产效率与员工技能水平。合理调配社会资源，关注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营造良好的企业运营环境，促进供需动态平衡。

最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与杠杆率，增强企业活力，夯实供需协同发展的微观基础。简化政府审批流程，降低行政与时间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通过跨市场采购降低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鼓励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合理配置资产与负债，增强资本实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首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与质量，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夯实内需增长的基础。通过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引导居民消费向高质量发展。利用媒体宣传与购物优惠等方式，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鼓励消费新模式与新业态发展，如绿色消费、数字消费与智能消费等，进一步释放内需活力。

其次，优化住房市场结构，降低刚性需求者购房成本，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长期租房市场发展，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住房选择。通过政府干预与指导，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降低刚性需求者的购房压力。推动房地产业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方向转型，满足居民对宜居环境的需求，为扩大内需提供稳定支撑。

最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交通物流、防洪排涝、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将公共服务延伸至农村区域，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通过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注重基础设施的智能化与绿色化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硬件保障，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1).

[2] 刘鹤.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N]. 人民日报，2022－11－04(6).

[3] 彭水军，李之旭，黄鑫. 内资与外资的共生共赢：基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价值链新核算框架分析[J]. 管理世界，2024(4)：27－51.

[4] 张培丽. 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的逻辑与路径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3)：41－48.

[5] 洪银兴，王辉龙，耿智. 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夯实新发展格局的根基[J]. 经济学动态，2023(6)：3－14.

[6] 陈小亮，陈彦斌，王兆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演进及其对宏观经济治理的影响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5)：80－91.

[7] 王君，王璐瑶. 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23(10)：76－83.

[8] 文武，张海洋，詹淼华.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需主导化与产出波动[J]. 经济学家，2023(5)：33－45.

[9] 吴继英，崔静. 数字经济赋能扩大内需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多重中介模型[J]. 华东经济管理，2024(9)：14－27.

[10] 程抗，陈思瑶，李露，等. 劳动合同签订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 (5)：142－151.

[11] 孙久文，张翰.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与政策优化[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2－50.

[12] 史育龙.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加快释放内需潜力[J]. 宏观经济管理，2021(11)：12－14.

[13] 刘华，胡思妍，王姣. 扩大内需战略目标下提升居民消费潜力的税收政策[J]. 税务研究，2023(4)：58－63.

[14] 沈坤荣，周铃铃. 以量质协调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研究[J]. 经济纵横，2023(10)：41－52.

[15] 毛其淋，王凯璇. 互联网发展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基于企业库存调整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3(8)：137－154.

[16] 何大安，许一帆. 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J]. 经济学家，2020(4)：57－67.

[17] 周密，刘秉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J]. 经济研究，2017(2)：67－81.

[18] 卢露，杨文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企业杠杆率调整：基于上市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2020(7)：15－27.

[19] 刘坤. 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N]. 光明日报，2023－01－19(2).

[20] 孙久文，李承璋. 需求侧与供给侧结合的消费升级路径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2)：52－62.

[21] 刘伟. 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学习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J]. 治理研究，2024(1)：4－12＋2＋157.

[22] 孙薇，叶初升. 政府采购何以牵动企业创新：兼论需求侧政策"拉力"与供给侧政策"推力"的协同[J]. 中国工业经济，2023(1)：95－113.

[23] 李冠华，陶帅. 家庭收入波动、杠杆率与消费支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J]. 南方金融，2022(1)：12－25.

[24] 李爱，盖骁敏. 就业极化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J]. 经济问题，2019(12)：1－7.

[25] 简新华，程杨洋.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四大战略和两个有机结合[J]. 上海经济研究，2021(8)：16－28.

[26]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周学东，李宏瑾，等. 预算软约束、融资溢价与杠杆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机理与经济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2017(10)：53－66.

[27] 新华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5－12－22(1).

[28] 丁志国，张炎炎，任浩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效应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7)：3－25.

[29] 刘斌，黄坤，王雷. 谁更愿意去库存：国有还是非国有房地产企业[J]. 经济研究，2018(6)：112－126.

[30] 郭克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经济研究，2022(5)：4－12.

[31] 黄群慧，陈创练. 新发展格局下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协同[J]. 改革，2021(3)：1－13.

[32] 任保平，苗新宇.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评价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2(8)：19－30.

[33] 祝树金，彭彬，段凡，等. 要素流动视角下县域高铁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2－73.

[34] 李志龙.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 地理研究，2019(3)：643－654.

[35] 肖黎明，张仙鹏.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J]. 自然资源学报，2019(2)：312－324.